

汉字与汉语教学

周质平

摘要

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汉字是学习汉语不能少的一部分，但汉字教学绝不是汉语课的主要部分。汉字教学是为汉语教学服务的。语和文的关系不但是先后而且是主从。

许多汉语老师对“听说读写”四种技能中“写”的认识，还始终停留在“用手握笔”写汉字的阶段，其实，由于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用手握笔”“写字”的这个技能，已渐渐为手指与键盘的配合所取代。换言之，“打字”已经取代了“写字”。这个趋势，不独中文为然，所有语文，都在经历由“手写”到“机打”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之下，“写字”不再是“写作”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汉字 汉语教学 语文改革 字本位 音本位

一、从“形本位”转向“音本位”

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汉字是学习汉语不能少的一部分，但汉字教学绝不是汉语课的主要部分。汉字教学是为汉语教学服务的。语和文的关系不但是先后而且是主从。所谓“先语后文”或“语文并进”经常被理解成“语文各半”，这是很大的误解。就课堂时间的分配而言，语文所占用的时间比例，不是50/50，而是90/10（初级入门头几周），稍后，汉字在课堂中就不再占用教学时间了。即使在头几周，老师只是介绍汉字发展的大略历史和基本结构，并不是企图为课文中的汉字，做逐字的说明和分析。

我们必须承认：汉字发展到楷书之后，在字形上所能反映的字义是极其有限的，更不要说20世纪中期以后的简化汉字了。

在三千多年汉字的发展史上，简化是大方向，汉字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演进到今天的简化字，真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但“面目全非”的变化，丝毫不影响汉字“达意”的功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和亿万人的使用已经为汉字的适用性作出了最有力的证明。过分强调汉字的字源和本义，是变相的强调汉字的原始性和不变性。给洋人一种错误的引导，似乎汉字自甲骨以来，在构形上基本不变。

洋人对汉字最大的误解是每一个汉字不是“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象形”，就是“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会意”，至少也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指事”。换句话说，汉字的字义都是透过字形来表达的。其实，在现行常用的汉字中，“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才是最大多数（许慎著、段玉裁注，1965，序761-764）。然而，这一结构却往往为汉语老师所忽略。我相信：几乎所有的汉语老师在介绍汉字的时候，都用过“日、月、山、川”这几个例子，可有人用过“钢、铜、铈、铀”这样的形声字？汉字是个千年老人，但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文明中，依旧游刃有余。连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铀、钚这样的化学元素，汉字一样可以表达出来。汉语老师在介绍汉字时，要由“厚古薄今”的取向，转而为“古今并重”。并说明这个千年老人与现代科技兼容无间，甲骨篆隶，文房四宝是它早年的归

宿；拼音简化，电脑手机，是它今天赖以生存的“中国功夫”。前者是前生，后者才是今世。如今汉语老师几乎只讲汉字的前生，而忽略了它的今世。

在极其有限的课堂时间中，大讲汉字的历史和结构，绝非最有效的利用课堂时间。这种本末倒置的作法，使汉语教学成了变相的汉字教学。学生牺牲了听说能力的培养，而未必能掌握读写。

汉字是由形音义三部分组成的。所谓“字本位”，是特别重视汉字的“形”。对汉字的字形有种牢不可破的信念，认为不但由“形”可以识“义”，甚至由“形”可以识“音”。因此学习汉字必须由形入手，于是每一个汉字的部首、部件、笔画，都必须细加分析，这是掌握汉字的不二法门。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字本位”，不如说是“形本位”。这一点，陆俭明先生（2011，页 228-229）对白乐桑先生的观点，有扼要的总结：

白乐桑先生的“字本位”教学模式，从教汉字入手。而教汉字不是只简单地教一笔一划的书写法，而是对研究确定的 400 个常用汉字，讲每个字的笔画，讲每个字的笔顺，讲偏旁，讲每个汉字部件与结构组合，讲每个字的字源，讲每个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形体变化，讲字里的文化，讲每个字的字义字音，讲由字到词的组合。这样的教法可以让学生得到解开汉字之谜的满足感，可以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可以培养学习者认识、掌握汉字的自豪感，从而有利于汉语学习。

我们试想：这是一门零起点的汉语课，学生对汉语一无所知，那么，这门课的授课语言必须以学生的母语来进行。而汉语老师中，外语水平能达到讲解文字学水平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即使外语水平足以应付，汉语老师文字学的训练和知识，也未必能胜任这样细致的讲解。结果，这样一堂课，老师喃喃自语，学生昏昏欲睡。在黑板或 PPT 上，画上几个日月山川的甲骨、小篆，让不知汉字为何物的西洋

人，误以为每个汉字都是一个图形，每个汉字都能找出字源本义。

这样的课只见汉字，而不闻汉语，不说汉语。这哪里是一堂汉语课！“以语带文”，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听说领先，读写跟进”是1940年代以来，赵元任在汉语教学上最大的突破和贡献。“字本位”的教学法是走向语文分流的老路，是开倒车。汉字之所以成为汉语课上的难点和绊脚石，“字本位”的教学法不但不是解决之道，反而是问题产生之所自来。脱离了口语的汉字，成了真正的“死文字”。

所谓“字本位”的汉语教学，既无视于几千年来汉字的演进发展，也无视于最近20年电脑和手机的普及。汉字经过甲骨、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和现行简化字的演变，除了极少数汉字还依稀保有原形之外，绝大部分的简化字离其原形，早已无从“认祖归宗”。

早在1930年刘复编《宋元以来俗字谱》就已指出：

我以为汉字在没有能找到极好的方法改为拼音制之前，写简笔字实在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过渡方法。若说简笔字不合于六书，则太阳并不是方的（“日”），狗并不是两条腿（“犬”），试问楷书之合于六书者安在？

我引这段话，并不是同意汉字拼音化，而是指出，在现行简化字设定颁行之前，刘复已经有“楷书之合于六书者安在”这一问，90年后的今天，如果还想从现行简化字之中，寻字源本义，那真是缘木求鱼了。

我且举几个最浅近的例子来说明汉字的“形”既不足以表义，也不足以表音。“字本位”对汉字字形的迷信，在现行的汉字中很难体现。

“我”字，《说文解字》作，“施身自谓也。或说我，顷顿也。从（戈）。”段玉裁对“我”字的左半边已经“不定为何字也”。（许慎著、段玉裁注，1965，页638-639）

“也”字，《说文解字》作，“女阴也。从象形，亦声”。（许慎著、段玉裁注，1965，页633-634）

当时大概有人怀疑，我们天天说天天用的“也”字，其本义竟是“女阴”，所以段玉裁，特别加了一个注：

此篆女阴是本义，假借为语词，本无可疑者，而浅人妄疑之。许在当时，必有所受之。不容以少见多怪之心测之也。（许慎著、段玉裁注，1965，页 633-634）

“是”字，《说文解字》作，直也。从日正。段注云：

十目烛隐，则曰直。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许慎著、段玉裁注，1965，页 70）

“那”字，《说文解字》作，西夷国，从（邑）声。安定有朝那县。（许慎著、段玉裁注，1965，页 296）

“这”字，从辵（*chuò*），言声。本义“迎”。

《正字通》周礼有掌讶，主迎。讶古作这。毛晃曰：凡称此个为者个，俗多改用这字。¹

“我”，“也”，“是”，“那”，“这”这五个字，无论谁来编初级汉语读本，都得在头几课中出现。若照“字本位”的教学法处理这五个字，从字源、本义、演变、部首、部件，上推甲骨文，面面俱到地来讲这五个字的历史，一节课未必能讲清楚一个字。而学生在往后的汉语学习生涯中，再也碰不到“也”字、“是”字、“这”字、“那”字的本义。这样 50 分钟的一节课，如果是文字学，当然另当别论。但如果是初级汉语课，这样的处理，真是误尽苍生。

中国人习得汉字，一般来说，是一个归纳和演绎的过程。学会了“狗”字，又学了“够”字，又学了“苟”字，于是有了一个大略模糊的印象：凡有“句”这个部件的汉字，似乎都读 *gou* 声。偏偏“句”这个字单独出现的时候，读如“巨”。我们常说“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这是用来取笑浅学的人误读白字，并不是用这句话来表示汉字结构之严谨。古今音变等专业的议题，绝非一般人在学习汉字时所关注的。

汉字中有许多一字多音的字，如“还”字，“你还欠款 100 元”。到底是还 (*hái*) 欠款，尚有 100 元欠款；还是还 (*huán*) 欠款，欠债还钱，全由读音决定。再如“好”字，是“好 (*hào*) 好 (*hǎo*) 色”还是“好

1 《康熙字典/酉集下/辵字部》有关“这”字的演变，详情请参看徐曼曼（2012）。

(hǎo)好(hào)色”，前者是喜欢美色，后者是好色成淫。这样的不同分辨，绝不能求之于字形，而必须求之于字音。

“字本位”的教学法，是鼓励学生在看到一个新字的时候，用所谓的六书原则进行猜谜，这种猜字的作法，是汉代的许慎、清代的段玉裁，这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字学大家，透过篆书都做不到的事，现在却寄望洋人用现行的简化汉字来识得其形音义，这真是了不起的“中国梦”了！

无论华洋，习得汉字的过程，不是“囫囵吞枣”，就是“依样画葫芦”，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中国人到底有几个汉字，是经过仔细分析学来的？比如：《说文》序中用来作为“会意”字代表的“武、信”“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对喜欢在汉语课中大谈所谓“文化”的老师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但试问：在座各位到底有谁是这么学来“武、信”这两个字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写了一辈子“武”字，从来也不知道原来这是“止、戈”二字“会意”而成。

强调字形的“字本位”教学法，所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引起学生对现行简化字的“不信任”和“不满意”。若过分夸大美化汉字的原形本义，则现行的简化汉字在洋人眼中，不过是对传统汉字形体破坏后的一种残留。这样的印象不但不能鼓舞洋人学习汉字，反而大大打击了他们学习简化汉字的积极性。

在初级汉语课中大讲《说文》，讲字源本义，就如同在初级入门的汉语发音课中大讲《广韵》古今音变，这不只是杀鸡用牛刀，简直就是无的放矢。《说文》《广韵》当然是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的经典，但和初级入门的洋学生学初级汉语，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喜欢在初级入门的汉语课中讲字源本义的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突出了汉字的“神圣性”和“神秘性”。这两种属性，相伴而行。惟其神圣，所以神秘；惟其神秘，所以神圣。汉字中似藏有无尽玄妙，无穷色相。中华民族先民的哲学思想、风俗习惯、社会结构、政治制度都可以求诸汉字。对汉字一旦有了这样的看法，讲起字源本义来，唯恐其不够古，不够玄。由此所引发出来的所谓“俗文字学”，

对汉字字形任意穿凿附会，瞎编乱套，还洋洋得意，以为示洋人以学习汉字之门径。这种作法，在我们这一界里，真是贻笑大方，既“诬”汉字，又“误”洋人。

一个汉语老师对汉字的態度，要有一定知识上的诚实，所谓“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许多常用汉字，我们是不知其字源本义的。正如许多极简单的英语单字，我们并不知其字源本义是同样的道理。

二、从“手写”到“机打”

许多汉语老师对“听说读写”四种技能中“写”的认识，还始终停留在“用手握笔”写汉字的阶段，其实，由于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用手握笔”“写字”的这个技能，已渐渐为手指与键盘的配合所取代。换言之，“打字”已经取代了“写字”。这个趋势，不独中文为然，所有语文，都在经历由“手写”到“机打”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之下，“写字”不再是“写作”的必要条件，许多洋人用手写不出几个正确像样的汉字来（其实中国人写白字错字的人也与日俱增），但却能在手机电脑上打出颇能表情达意的信或文章来。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认真严肃地来重新审视用手握笔“写字”在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因为科技的发达，“识字”和“写字”的距离，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任何一个能用电脑输入汉字的人，只要能“认识”那个汉字——从同音字中选出对的汉字来，也就能“打”出这个字来，于是便完成了所谓“书写”的任务。

在地铁公交上，我们看到小学生、初中生埋头用两个手指，飞快地摁着手机，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正在“写”信。虽然此“写”，已非“笔”写，但是他们在“写”信，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我相信，以后“提笔忘字”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但只要一打开手机、电脑，所忘的字，就都认出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说的汉字书写能力，与其从字形入手，不如从语音入手。换句话说，书写工具的改变使“发对音”成了“写对字”的先决条件。

所以，汉字书写能力的培养必须先从发音准确入手。部首字形的

分析、笔画顺序和手写汉字的重复练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占多少分量，是值得老师们重新考虑的。

为了进一步深化现代汉语的口语教学，赵元任在1968年出版了三册《中国话的读物》*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并杜撰了一个英文字 *sayable*，亦即“可说的”。由此可见，他是非常有意识的，要把对外汉语教学由书面转向口语。

赵元任提出“可说的”中文这一概念，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意义是：汉字是为汉语服务的。在《国语入门》中，将“告诉”写作“告送”，“待了一回儿”，写作“猷了一会儿”，就是最好的例子。赵元任（1983）在他的《通字方案》中，提出许多同音字是可以合并的。这在一般人看来，离提倡写“白字”已相去不远了。换句话说，为了让学生说对，宁可写白字，以免误导学生发音错误。这一概念转换到实际教学上，则应该体现在，老师对汉字错误的容忍应该扩大，而对发音错误则必须严格要求。眼下许多对外汉语课的老师则恰恰相反，对洋人学生写汉字的笔画、笔顺斤斤计较，对洋人说汉语的洋腔洋调则听若罔闻，一任其泛滥。殊不知，发音上的错误是外语学习中“化石化”早发和多发的所在，发音一旦错误，往往成为终身顽疾。所谓“一失音成千古恨”，要想改正是极其困难的。

对美国学生来说，学习汉语最困难的部分并不是语法的结构，也不是汉字的书写，而是声调的掌握。赵元任在《国语入门》这本教科书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是：要想学好中文，发音准确是基本功，而在准确和流利之间，准确必须是流利的基础。他（1980，页156-157）在《外国语的学习跟教学》的讲演中特别强调发音的准确不但要“以百分之百”为目标，而且必须在学习之初打好坚实的基础。

三、另眼看汉字：“少不了”，但未必“动不得”

为了打破对汉字“神圣性”和“神秘性”的迷思，并建立起对汉语汉字正确的看法，最有效的办法是回顾晚近120年来语文改革的历史。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汉字是不可能由世界语（*Esperanto*）或拼音

来取代的，汉字是汉语最好的搭配，换句话说：汉字是少不了的。但是“少不了”和“动不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少不了”的东西，未必“动不得”。从甲骨文到现行的简化字，在外形上，面目全非，但在本质上却一无改变，汉字基本上依旧是“图像”，而非拼音。汉语、汉字有千万年的历史，但在电脑手机的新时代里，依旧枝叶繁茂，生机勃勃，丝毫不显老态。一个汉语老师要能以“浴火重生”、“老干新枝”的认识来看待我们的祖宗遗产——汉语和汉字。

甲午(1894)战争之后，最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议题是：“中国为什么这么落后？”著名的西方学者像美国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英国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也都参加了这个讨论。杜威(1929, 页373-377)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人口过多，沉重的人口负担，抵消了一切的努力和成果。罗素(1922, 页15-44、210-225)则认为中国人一向安于现状，不进步正表示文化上的优越，真是各有见地。但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元凶祸首是汉字。正因为如此，汉字自甲午战争之后，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而“废灭汉字”也成了时髦的口号。许多饱学的知识分子和语文专家，都毫不迟疑地用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汉字，表现出一种“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强烈情绪。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敢于批判自己的文化，如鲁迅在小说杂文中指出中国人的愚昧、冷漠、无知；吴稚晖要中国人把线装书丢进茅厕；胡适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这种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都起了相当“揭出病毒”，并引起疗救注意的功效。唯独“废灭汉字”这一点，是个诬告，让汉字蒙受了近百年的“不白之冤”。

和白话文运动相比，汉字革命，开始得早，但在成效和影响上，是无法和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的。胡适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可以视为白话文运动的开端，在短短几年之内，小学的课本已经改用白话²(费锦昌主编，1997, 页33)，文体的改革有了可观的成

2 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四月，教育部又发出通告，分批废止以前的旧国文教科书，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

绩。白话文早已是现代中国人视之为当然的通用文体，而文言文则成了走入历史的“古代汉语”；可是，比白话文运动开始更早的汉字改革，在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除了在字音上制定了一套拼音系统，在字形上稍减繁重以外，汉字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

汉字革命对汉字本身的改变虽然非常有限，但“废灭汉字”这一激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却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极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一现在看来近乎荒唐的主张，何以在当时竟能让许多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之摇旗呐喊，神魂颠倒？

四、富强由文字

近现代中国的语文改革运动，一般都以1892年卢懋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为起始。早期主张语文改革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语文改革的动机和原因归结于求中国富强或普及教育。结果是把单纯的语文问题和国家民族的兴衰，在相当的程度上，混为一谈。卢懋章在《一目了然初阶》自序中说到他创制切音新字的动机：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定，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懋章，1956，页3）

这样的逻辑，现在看来，是非常草率的，其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经科学的验证。但这种“富强由文字”的提法，却成了往后文字改革者的基调，即使用词稍有不同，但基本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钱玄同在1922年所写的《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一文中，开宗明义所说的依旧是同样的道理：

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钱玄同，1999，卷3页17）

将国家富强与语文改革相提并论，是当时许多人都能接受的提法。似乎保留汉字则中国亡，而废灭汉字则中国兴。在“救亡兴国”这样冠冕的理由底下，任何为汉字辩护的言论，几乎都要背负起“不顾国家兴亡”的责任。而走激进废灭汉字的道路，成了一种爱国的表现。改革语文只是手段，而国家富强才是目的。为了废灭汉字，而改用拼音，主张改革者往往不惜夸大汉字的缺点，美化拼音的优点，并进而强调文字只是一种工具，与历史文化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一种强烈的民族耻辱感和要求尽速富强的诉求之下，近现代中国的语文改革运动出现了极有趣的矛盾现象，即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往往透过最极端的国际主义形式表达出来。废灭汉字，提倡世界语或拉丁化，正是这一矛盾现象的显例。主张语文改革者，一方面是极端的反传统，一方面却又极端的爱中国。为了缓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们常常把文字从历史和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视之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

这种“工具论”，大概是五四前后，主张语文改革者的时髦理论。1918年，钱玄同在《答陶履恭论 Esperanto》的文章中指出：“玄同对于文字之观念，以为与度量衡、纪年、货币等等相同，符号愈统一，则愈可少劳脑筋也”（1999，卷1页99）。把语言文字和度量衡等同看待，是把人类最复杂的沟通工具过分的简单化了。一个民族的语文岂是能和文化历史截然分开的？更何况，即使度量衡也不能完全脱离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就如美国，至今坚持采用英制，而不用公制。连度量衡都能有这样的“惰性”，就更不用说语言和文字了。

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第三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汉语改用拼音

文字的初步谈》，强调指出：“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作用。”所以，在谈文字问题时，他们唯一的考虑是“方便”和“有益”，此外，“绝不承认文字里面有不可侵犯的质素。”并将汉字贬得一文不值，文章是这么开头的：

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的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页 391-408）

必须指出：一个民族的语文决不是一个可以任人装饰打扮三四岁的小姑娘。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亿万人的使用，一个民族的语文是有其个性和特点的，汉字和汉语是分不开的，两者依存的关系是不随个人意志而转移的。钱玄同、傅斯年这批五四前后高谈汉字革命的知识分子只看到汉字的老朽和繁重，而看不到数千年来中国文化赖汉字而传承，这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赖汉字而沟通、统一的历史事实。他们常把汉字这个千年老人，当成了三四岁的小姑娘。结果许多高论全成了纸上谈兵，与实际全不相干。

文字就其功能的一方面而言，似乎只是一个载体，一种工具；但若就其形成的历史背景而言，文字是语言的反映，是文化的载体。文字和它所承载的内容有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

五、汉字革命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

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钱玄同，1999，卷3页62）

今天，回看钱玄同当年对汉字的指控，我们不得不说，汉字是无辜的。近一百年来，中国的进步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教育的普及，国语的统一，新知的传人，在在都有可观的成绩。而汉字则除了稍减繁重之外，依然故我，丝毫没有从图像 (graphic) 表义的基本结构转向字母拼音的迹象。显然，汉字并不是近现代历史上使中国停滞不前的绊脚石。

1922年，钱玄同为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写信给周作人，请他投稿，钱玄同说，这次“汉字革命”和当年“主张通俗教育的人们（如劳乃宣，王照之流）”所提方案是有所不同的。劳王诸人的方案不免是“做给小百姓吃的窝窝头”，而他这次的方案是“是对于鱼翅燕窝改良的食物，是鸡蛋牛乳之类。”（1999，卷6页54）这固然只是一个有趣的比喻，但却很能看出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隔阂，在钱玄同看来，废灭汉字，改用世界语或拼音文字是给小老百姓“鱼翅燕窝”吃，至不济，也是“鸡蛋牛奶”。殊不知，在知识分子看来是“补品”的“鱼翅燕窝”，在三餐不继的小老百姓眼里，则是无济于事的废物。

1936年，周作人在和胡适讨论“国语与汉字”一次通信中，间接地回答了钱玄同14年前所提的这个方案：

用罗马字拼口语写出大众易懂的文章来，这不失为一个好理想，犹如人应长生，活到一百岁以上的提议，没有反对的道理，但是在正患肺病的时候，晒晒太阳，吃点鱼肝油，增加体内的抵抗力，实在也是必要。

在这样的基础上，周作人提出了一个“卑之，无甚高论”的提案：“语言用非方言的一种较普通的白话，文字用虽似稍难而习惯的汉字，文章则是用汉字写白话的白话文：总括一句，即是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周作人、胡适，1936，页4-5）周作人的这个提法是远比钱玄同的方案更切合实际的。可惜，这样的“卑之，无甚高论”引不起大家的注意。

1922年，黎锦熙发表了《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指出汉字无论就“结构”或“涵义”而言，“全是停滞于古代社会的文化与思想，它们的用法，变动流转，又和语言绝不相谋，到了现在，只成了……一种单表音节的抽象的符号，既无意识而又繁琐的东西。”（黎锦熙，2004，页31-32）汉字在这批新派知识分子的笔下，何止是“一无是处”，简直是“恶贯满盈”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词类连书”的主张。企图解决汉字拉丁化中，单音节所带来的困难。他坚信拼音化是汉字革命“前进的一条大路”。（页38）

1936年，黎锦熙发表《建设的大众语文学》，将汉字的问题总结为：“就‘大众语文’这一点上说，汉字当然不是好工具，是坏工具，四十年来，经过种种的比较研究，大家目击身验，铁案如山，不必再论。”（页28-29）这是经过几十年审理之后，对汉字有罪的判决书。

1934年鲁迅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谈到“大众语”的问题：“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鲁迅，1981，卷6页76）。这几句话，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20世纪中期以前语文改革者的一些主张。其实，鲁迅自己对语文改革的许多意见同样落入了他自己所说“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的下场。如他的支持世界语、大众语和拉丁化都属此类。

当时这批文字改革者的最大错误是误以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1981，页76）所有主张废灭汉字的人都认为：汉字太难，非“愚昧”之“大众”所能学习。鲁迅夸张地说：在“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1981，卷6页98）在《中国

语文的新生》一文中，鲁迅将类似的意思用另一种方式说出：“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1981，卷6页115）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鲁迅用“结核菌”来比喻汉字：“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1981，卷6页160）1934年，鲁迅发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在文末，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1981，卷5页557）鲁迅虽然没有直说，但答案是极明显的：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主张保留汉字。

时至今日，汉字既没有牺牲掉中国人，中国人也没有牺牲掉汉字。两者共存共荣，相安无事。经过百余年改革汉字的努力之后，我们不得不说：在名目繁多的汉字改革方案中，还只有汉字是“大众”唯一能接受的沟通工具，倒是“世界语”、“国语罗马字”、“拉丁化”等“与大众势不两立”，毫不相干。事实证明，汉字保存下来了，而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并没有成为“文盲”来“殉难”。

鲁迅一方面极力贬低汉字的价值，夸大汉字的“罪状”，另一方面则对拉丁化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国等于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1981，卷5页557）从1931年发表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可以看出，这个运动的最终目的是：

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汉字），以纯粹拼音文字来代替……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要采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的文字，要注重国际化的意义。要达到以上的目的，只有采用拉丁字母，使汉字拉丁化才有可能。（周有光，1961，页45）

拉丁化新文字的目标是“通俗化”、“科学化”、“国际化”，但实

际的情况则是，一旦脱离了汉字，以任何方式创造出来的新文字是离“劳动大众”更远了，而非更近了。王力在1936年所写《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一文中说得很好：

在现在中国的环境里，民众所急急要认识的是汉字。如果你教他们认识一个新文字而不认识汉字，他们在现在社会里依旧是些文盲。（页7）

瞿秋白（1989，卷3页241、247）在《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一文中，将汉字比喻为“僵尸”，并以极为耸动的语言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毛坑！”1949年之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汉字走拼音的道路被视为正确的方向，因此，所有污蔑汉字，美化拉丁化的言论，都受到官方的容忍，甚至奖励。上引瞿秋白对汉字这样的践踏和谩骂，显然已经逾越了学术讨论应有的理性态度，但却没有人指出瞿秋白的不当。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语文改革，往往和当时的政治走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0年代初期由赵元任主导的国语罗马字，和1930年代由瞿秋白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都曾引起一时轰动，但那毕竟只是昙花一现。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解决了用字母拼写来表示汉语声调的问题，但由于规则过分繁复，除了在字典上作为标音的辅助以外，在实际生活中，几未起任何作用。至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而今回看，顶多只是为部分的汉语方言提出了标音的构想，全无任何取代汉字的可能。然而鲁迅却把这样一个在现在看来极为草率的提案，认为是“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瞿秋白（1989，卷3页280）在《新中国的文字革命》一文中，对汉字的拉丁化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憧憬，似乎只要汉字一去，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就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新中国的文字革命就是要完全废除汉字和文言，采用罗

马字母和拼音制度，造成一种新式的中国文——几万万群众所能够运用，容易学习，而且可以用来参加高深的学术文化生活的一种文字。

当时高谈拉丁化、大众语的学者，口口声声把大众和工农兵认作是服务的对象，但真正的老百姓看到这些字母拼写出来的文字，真是有如天书。因此，这个运动最大的讽刺是：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之后，全中国的人，除了那几个提倡者之外，怕都要成了文盲。

1935年，胡适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分析了甲午之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音标文字运动”失败的三个原因：第一，“标准字母”始终不曾确定；第二，提倡者没有用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的决心，音标只是“为汉字添了一种辅助工具”；第三，提倡拼音文字，而不同时提倡白话，所谓“国语统一”的工作只是“汉字注音”，“和国语统一无干，和白话教育也无干”（胡适，1990，页6-12）。可是，就现在中国的语文环境而言，我们有了统一的汉语拼音，白话也早已取代了文言，并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也曾努力地走拼音的方向，然而，拼音文字依旧没有任何取代汉字的迹象。换句话说，胡适也小看了汉字的权威，并高估了拼音和汉语、汉字的兼容性。过去近百年的实验证明：拼音只能止于汉字注音的工具，而无取代汉字的可能。

1936年，胡适在和周作人讨论“国语与汉字”的通信中，总结了自己对语文改革的基本态度：

我对于这个国语与汉字的问题，向来没有很坚强的意见。把文字看作纯粹的教育工具，我当然诚心的赞成汉字的废除和音标文字的采用。但我又是个有历史癖的人，我的历史眼光使我相信文字是最守旧的东西，最难改革——比宗教还更守旧，还更难改革……所以我不期望在最近百年内可以废除汉字而采用一种拼音的新文字。（周作人、胡适，1936，页5）

胡适是语文改革运动中的温和派，他的言论和钱玄同、鲁迅的相比，持中平允得多，但稳健如胡适，依旧觉得汉字该去，虽然他说百年之内看不到汉字的消亡，但似乎百年之后，汉字终有废除之一日。这段话是1936年说的，去今已有83年，距胡适所说的百年，只剩17年。但我们此刻实在看不出汉字“寿数已尽”的任何征兆。

以钱玄同、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这批语文改革者，他们往往只就理论上谈文字改革“好不好”(desirability)的问题，而很少触及到实际“可行不可行”(feasibility)的问题。所有提倡“世界语”、“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的种种理论，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就是“简单”。似乎简单的就一定好，简单的就一定可行。经过几十年的尝试和努力，实践证明，简单的未必好，简单的也未必可行。在语文改革这个议题上，“好不好”和“行不行”是一体的两面，再“好”的方案，要是“不可行”，那么，这个方案依旧不是个“好”方案。至于所谓简单，那得看是用谁的标准来论断，拼音文字对西方人来说，固然比汉字简单，但对中国人而言，汉字未必比拼音难。

1961年，周有光发表《汉字改革概论》，说到拉丁化新文字的失败，语气是惋惜的，并多少将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严厉地查禁拉丁化运动”。(页47)其实，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之终归失败，与国民党之查不查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即使国民党全力提倡，拉丁化依旧难逃失败的最后命运。

汉语汉字之不能拉丁化并不是个政治问题，而是个不折不扣的语言问题，无论谁来主政，无论信仰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解决不了汉字拉丁化的问题。

中国早期的语文改革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语文改革视为为另一目的服务的手段，这个目的可以是救亡，是启蒙，是扫盲，结果，语文改革的必要性往往成了一个政治、社会或教育的议题，而并不是汉语汉字的本身适应不了新的生活内容。诚如王力(1936, 页6)在《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一文中所说：“汉字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始终没有走到拼音的途径，这虽可以有其它的原因，但我们该承认汉字自身

实有充分表达思想的能力。”而今看来，当时对汉字的种种责难，大多是主张改革者坐在书斋里冥想出来的。换句话说，汉语汉字并没有这批改革者所说的如此不堪。

六、汉语汉字的新生

30年前，正当英特网、电脑化方兴未艾之际，汉字又面临了一次科技革命的挑战。在软件和输入技术不断改进之后，汉字在这个英特网的时代，也并没有为日常生活上的交流带来明显的不便。如果说，在电脑输入上，汉字没有英文那么快捷，于是就遽下结论：汉字不如英文进步，是一种原始的工具，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来适应电脑的输入。这样的论调，乍听似有道理。但稍一推敲，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如汉字不能适应电脑的操作，需要改良的是电脑，而不是汉字。汉字存在已有数千年，电脑不过是近几十年来一个新的科技产品。汉字不为电脑服务，其理甚明；倒是电脑则应该为汉字服务。一方面，汉字固然需要电脑化，但另一方面，电脑也需汉字化。

审视百年来中国语文改革的历史，所有取代汉字的方案，诸如“国语罗马字”、“世界语”、“拉丁化”、“汉语拼音”等等，都未曾动得汉字分毫。热衷于革命的语文改革家似乎都太小看了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汉语和有数千年历史的汉字了。钱玄同在1923年，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之后，非常乐观地说：“我希望从1932年以后，入学的儿童不再吃汉字的苦头。”（1999，卷3页83）他以为10年之内，就可以让汉字“销声匿迹”了！这也未免错估得离谱了。傅斯年在1919年，也犯过相同的错误，他希望“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在十年后入墓。”（页391）

套一句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都是有道理的。”我们祖先之所以没有走上拼音的道路，正是因为汉字是最能适应这个多民族、多方言国家的书写工具。汉字以图像表义的内涵是可以超越方言的不同的。换言之，汉字是汉语最佳的搭配。

至于说汉字一定比拼音文字难识、难记、难学。这也很难说服一

个母语是汉语的人。任何人对自己的“母语”、“母文”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而觉得是最合理、最容易的语文。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好做中英文的“对比分析”，其结论则往往是“中文不如英文合乎文法，表达精确”之类似是而非的话。如钱玄同在1922年发表《“他”和“他们”两个词儿的分化之讨论》中指出：“我觉得国语的语法和欧洲语系的语法大有疏密的不同。国语因为语法太疏，语意往往失之含糊，容易发生误解。”（1999，卷3页119）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甚至主张，将“他们”这个词也以“阳性”、“阴性”、“中性”而区分为“他们”、“她们”和“它们”。这样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不但是“过犹不及”，而且是“多此一举”。

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武断地指出，中国文字“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绝不能代表 Lamarck, Darwin 以来之新世界文明。”（1999，卷1页164）钱玄同据以为废灭汉字的理由之一，是汉字不能表达他所谓的“新世界文明”。当然，“新世界文明”是个极笼统的概念，确切的内容是什么，他不曾界定过，我们也不拟在此讨论。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他看来，汉字这个“载体”，不但是“原始的”、“次等的”，甚至于是“恶劣的”。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把孔学、道教和汉字是视为一体的：“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犹不可不先废汉文。”其实这一说法，和前面所说文字是纯粹工具的说法，有一定的矛盾。纯粹的工具是中性的，可是汉字却失掉了中立性，而和“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了。

即使退一步说，汉字真不足以表达“新世界文明”，中国人都废汉字，改习英文，或世界语，也许中国人能和“新世界文明”接轨了，可是英文或世界语能否表达中国人的思想和文明呢？钱氏的提法，而今看来，不免妄自菲薄过了头。

据钱玄同自己说，“玄同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假名，至于 ABCD 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1999，卷1页209）既然不曾学过西文，如何能下如此武断之结论？

钱玄同、瞿秋白等人有关汉字改革的议论，常给人一种错觉：汉字一去，新知即来，中国立能复兴。这种议论是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是禁不住推敲的。

瞿秋白（1989，卷3页212）在《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的中国文》一文中，说到中国语言的缺点，指出：

中国语言是很贫乏的——名词不够用，形容词粗浅，动词的概念模糊，尤其是细密的前置词缺乏——前置词的缺乏使这种言语里面表示方位的能力非常薄弱，而且最显著的是中国语言文字里面的所谓本质上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等，不能够变化自己的概念来表现更抽象的意思。

这段对中国语言的指控，乍看似“罪证确凿”，但只要稍一推敲，就不免漏洞百出。所有“优劣”、“精粗”的评价，都只能由比较得之，瞿秋白究竟是拿中国语言和什么语言比较，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凡是指出中国语文种种缺点的人，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都恨不得用一种更精确、更进步的语文来作为沟通的工具。因为中国语文的种种缺点，使他们有许多思想概念都因为工具的粗疏而无从表达。这显然不是事实。

我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实在不能同意中文不如英文的说法。英文中语意含糊的词汇和结构也是俯拾即是。至于说，有些英文词汇找不到相对应的中文词汇，这只是个翻译的问题，并非语文的本身比较原始、落伍。正如中文里有许多词汇，也没有相对应的英文翻译，像“性灵”、“神韵”、“意境”这些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常见的词语，翻译成英文时，大多只能采取音译，再另加说明，而无法直接翻成英文，我们大概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说英文不如中文吧。

即使退一万步说，中文真不如英文来得精确，但对母语是中文的中国人来说，英文再精确，再进步，也是徒然。语文固然只是一种工具，但这个工具既不同于度量衡，也不同于刀斧，并非人人得而

用之。语文这个工具，在使用者和工具之间，有很长习得和熟练的过程，而一个人的一生大多只能习得一种母语。我们之所以将这个语言，称之为“母语”，就是因为它像“母亲”一样，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别人的母亲也许更聪明，更漂亮，但“我”是不可能认“她”为“母亲”的。对中国人来说，中文永远是我们表达最精确，运用最有效的一个语文。即使钱玄同、瞿秋白也不例外。

所谓某种语文较另一种语文更精确的说法，与其把不精确的原因怪罪于语文的本身，不如说是使用者对这一语文掌握不足。

最近几年，汉语热成了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鸦片战争之后，只有中国人学外国话的份儿，哪儿有外国人学中文的事呢！而今风水轮转，外国人居然也学起汉语来了。而五四运动以来，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指为中国进步绊脚石的汉字，在经过近百年的批评、摧残、改造之后，居然屹立不摇，还在世界各地大出风头。这绝非当年主张废灭汉字、提倡拉丁化的学者专家所能梦见。

汉语汉字之所以由“冷门”变成“热门”，绝非因为汉语汉字的内在结构起了根本的变化。而是中国已经由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一变而成了雄峙于东方的一个大国，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上都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汉语汉字成了洋人了解中国必不可少的工具了。五四知识分子常有因果倒置的论断，以为中国的复兴端赖汉字的革命，而不知汉语汉字的复兴实有赖于中国的复兴。这一点，也适用于汉语教学界，既不必夸大汉字的作用，也无需担心文化的丧失，与其希求以“字本位”引起洋人对中文的兴趣，不如踏踏实实地教会他们说对话、发准音，才是务本之道。

参考文献

- 费锦昌主编 (1997) 《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33，北京：语文出版社。
- 傅斯年 (1919) 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1卷3号，391-408。
- 胡适 (1990) 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6-12，台北：业强出版社。
- 黎锦熙 (1936) 《建设的大众语文学》，页28-29，上海：商务印书馆。
- 黎锦熙 (2004) 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黎锦熙语言学论文集》，页31-32、38，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复、李家瑞编 (1930) 《宋元以来俗字谱》，1992年景印，4，台北：中央研究院。
- 卢戡章 (1956) 《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3，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鲁迅 (1981)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陆俭明 (2011) 我关于字本位的基本观点，《语言科学》卷10，第3期（总第52期），228-229。
- 钱玄同 (1999) 《钱玄同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瞿秋白 (1989) 《瞿秋白文集》（文学篇），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王力 (1936) 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独立评论》，205期，6-7。
- 徐曼曼 (2012) 近指代词，兹、此、这历时更替考，《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第13卷，第1期，27-31。
- 许慎著、段玉裁注 (1965) 《说文解字》，台北：艺文印书馆。
- 赵元任 (1980) 外国语的学习跟教学，《语言问题》，页156-157，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1983) 《通字方案》，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有光 (1961) 《汉字改革概论》，页45、47，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周作人、胡适 (1936) 国语与汉字，《独立评论》，207号，4-5。
- Chao, Y. R. (1968). *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 3 vols, San Francisco: Asian Language Publications, Inc.
- Dewey, J. (1929). What Holds China Back? Vol. 1, pp. 373-377, *Characters and Events*.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 Russell, B.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pp. 15-44; 210-225,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The I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CHOU, Chih-p'ing

Abstract

In term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learning Chinese, but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s by no means a major part of Chinese curriculum.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serves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ext is not only sequential but also primary-supplementary.

Many Chines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writing" in the four skills of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still remains at the stage of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by "holding the pen". In reality, due to great strides in modern technology, the skill of "handwriting" has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by putting finger to keyboard. In other words, "typing" has replaced "handwriting". This trend is not unique to Chinese; all languages are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handwriting" to typing. With this change, "handwriting" is no longer a prerequisite for "composition".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language reform, character-based language instruction, pronunciation-based language instruction